

## 中国确立“制造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张莱楠

当前,我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大的制造强国战略。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国家就难以从大国走向强国,特别是全球经济结构正经历深刻调整,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与我国形成较为激烈的竞争,我国制造业面临“前堵后追”的双重挤压,因此,确立“制造强国”战略尤为紧迫。

### “中国制造”仍处大而不强发展阶段

事实上,“中国制造”仍处于“大而不强”的发展阶段。从产业规模和结构看,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以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增长高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在规模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在快速升级,主要表现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例持续下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例不断上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2013年,我国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0%左右,201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08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占比约20%,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

我国工业如今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更多地体现为拥有完整的供应链条。根

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形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样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目前,中国工业竞争力指数在136个国家中排名第七位,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中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1/3;发电设备产量达1.2亿千瓦,约占全球总量的60%;造船完工量达4534万载重吨,占全球比重的41%;汽车产量达2211.7万辆,占全球比重的25%;机床产量达95.9万台,占全球比重的38%,我国制造业占世界的1/3强。

然而,我们仍处于“大而不强”的阶段,制造业普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差、核心部件对外依存度高、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与美、日、德等发达工业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 如何变道超车成为重要命题

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在这一关键历史

时期,如何变道超车成为重要命题。

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各国推出制造强国战略。世界各国为了寻找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出路,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美国、欧盟、德国、英国等纷纷推出制造业国家战略。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将焦点锁定在以新一代互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制备为代表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展开了新一轮的增长竞赛,试图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此后,美、德、日、韩等都推出了各项政策措施,鼓励和持本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美国政府在2012年推出《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同年12月通用电气(GE)提出《工业互联网》战略;2013年8月我国工信部发布《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8》;2013年底,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工业协会发布了德国首个“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以加强德国作为技术经济强国的核心竞争力。由此,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我国的“两化深度融合”、德国的“工业4.0”等几乎是殊途同归。

笔者认为,由院士专家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能否让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有以下几个核心关键:

首先,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科技资源,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游的核心、关键以及共性技术进行攻关,通过创新链驱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围绕传统优势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条,以创新链为引导,增强传统优势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拥有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传统企业集聚优势资源加速发展,从而带动整个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其次,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是布局高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必须高度重

视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加快推进重点行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基础坚实,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蛟龙”载人深潜器取得重大突破,智能制造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企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第三,坚持标准先行,把制定智能制造标准化作为智能制造的优先领域。把握智能制造发展特点和规律,整合国内标准化资源,借鉴德国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以及美国先进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标准建设的工作思路和方式,加快智能制造标准化体系建设。如,加快制定智能制造标准化路线图,尽早启动优先急需领域标准化制订工作,建设和推广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最后,通过“制造+服务”提升价值链控制力。当前,制造业服务化是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核心竞争力,也是提升价值链控制力的焦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通过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提升制造业的附加价值。以知识密集型为特点的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指研发新技术、新产品,还包括为推进生产经营管理方式的转变提供增值服务。需要以完善的市场环境为服务化转型保驾护航。制造业服务化的顺利推进需要完善的市场环境为其保驾护航。面向制造业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新技术研发、物流、技术支持、信息咨询、金融租赁和保险等服务需要完备的知识产权法规、健全的社会诚信体系、严格的监管体系作为保障。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 鹏眼 | Huang Xiaopeng's Column |

## 关于QE、中国版QE问答



黄小鹏

问:为什么“量化宽松”是市场强力争奋剂?

答:正如它的字面含义,量化宽松(QE)是中央银行向市场注入预定数量的流动性。

日本是量化宽松的始作俑者,互联网泡沫破裂后,日本央行用尽一切政策仍然无法阻挡衰退,2001年启动QE。美国、欧洲则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用各种常规手法仍然无法有效稳定金融市场,于是步日本后尘实施QE。它们共同的背景是,在QE实施之前,短期利率都已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了。

常规货币刺激也涉及流动性注入,但与量宽仍有很大区别。常规政策一般只影响短期流动性,且它注入流动性数量是不确定的。假如美联储要将基准利率从3%降到2%,必须公开市场上买入短期国债,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由于市场供需不确定,最终买多少国债是很难预测的。QE则不同,央行到市场上购买资产的数量是预先公布的,是确定的。

常规降息无疑也会对资产价格形成刺激,但这需要借助于投资者信心的提升才能实现,如果市场信心不振,资产(特别是期限较长的资产)的价格不会上升,QE则不同,央行直接到市场上购买资产,并且购买的大多是中长期国债等资产,具有直接的刺激效果。

问:QE是否会造成本行角色的异化?QE到底有没有对经济起到作用?

答:长期以来,央行向政府透支,为财政赤字直接融资都会遭受人们的猛烈批评,更不用说央行去购买抵押支持债券(MBS)、资产证券化(ABS)甚至股票了,QE彻底打破了传统禁忌。

早期的财政教科书对央行购买国债产生的负面影响、一级市场购买与二级市场购买之间的区别分析较多,现在看来这些分析有些已经过时了。QE的实践让人们看到,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购债行为与QE、一级市场买入与二级市场买入之间,都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事实上它们都是货币发行。

不同的是,在传统框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界限还算清晰,QE则让两者之间的区别完全模糊了。同时,QE还使央行独立性倒退,经过一次大危机,各国央行纷纷实行QE,它们确实已经变得让人不认识了。

客观地讲,QE对稳定金融市场,托住实体经济,是起了一定作用的,QE最大的问题是道德风险。金融危机的终极根源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如果有QE可以寄托,那么包括政府、个人、企业在内的各经济主体都会失去自我约束,对债务越来越上瘾,失衡无法得到及时纠正。

问:QE本质是货币发行,天量货币一般会造成本国通货膨胀,但目前看通胀似乎没有发生,这是什么原因?

答:不论是在常规货币政策下降低利率,还是QE,都会扩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都是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两者没有本质区别。

但是,在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发行与物价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货币数量论认为,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物价三者之间关系是稳定的,基础货币扩张必然引起物价上涨,历史上可能存在这么

一个阶段,但今天的情况已不再如此。2008年雷曼危机前,美国的基础货币是0.8万亿美元,今天则高达4.4万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但同期狭义货币量(M1)和广义货币量(M2)增幅仅为1.2倍和50%,同期消费物价(CPI)增幅则微乎其微。

QE向市场注入的基础货币大多停留在金融市场,并没有转化成货币供应量,没影响到CPI,但这些流动性推升了资产价格。理论上,如果央行在物价恢复正常时及时地收回基础货币,就不会对经济造成太大的危害,但这一过程充满风险。

问:既然QE没有造成通胀,那为什么还有人激烈地反对QE?

答:我想,至少有两点理由。金本位信徒质疑央行存在的合法性。美国有一个国会议员叫罗恩·保罗,写了一本书就叫《终结美联储》,详细论证了央行发行货币是对人们财富的盗窃。如果央行的货币扩张没有造成CPI上升,这种批评还成立吗?

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了解CPI与资产价格的关系,这两者既不同又有关联。QE等货币发行推高资产价格,资产价格最终会影响到CPI,但这种影响存在滞后,并且CPI的波动没有资产价格波动那么大。即使央行最终精准地将CPI控制在合理范围并结束QE,但此时资产价格已产生了很大的升幅。由于人们持有金融资产的数量差异巨大,QE的直接结果之一是贫富差距扩大,它让资产持有者更富有,金融业利润更丰厚,而那些持有银行存款的人未能享受资产升值利益,反而会因利率下降而遭受损失。

第二,就是前面所说的道德风险。传统的货币政策也存在道德风险问题,QE无疑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了。

问:为什么说中国版QE是夸大其辞、不专业的说法?

答:“QE”、“1万亿”的字眼是很刺激人神经的,但预期有一个中国版QE其实是误读。

首先,中国不具备推出QE的环境,因为短期利率远高于零的水平,通过降准等常规方式注入流动性的空间很大。其次,直接购买地方债在法律上行不通。第三,通过将地方债纳入抵押品范围而定向注入流动性,这种做法本质上常规货币政策的结构化操作,与QE的概念差异很大。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曾经使用过融资换贷款计划(FLS),定向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等方式进行定向注入流动性,中国央行也推出过抵押补充贷款(PSL),但这些都是QE,从结果来看,这类操作的效果取决于金融机构的态度,与QE的确定性相差甚远。

当然,正如前面所说,不论形式如何,反正都是注入流动性,没必要在名词上过于较真。对于投资者来说,应该关注市场流动性状况及央行调节流动性的力度,媒体也不应该动辄使用QE一词,以免产生误导。

当前市场确实存在适当增加流动性的必要,但是,地方债置换困难不是单纯的流动性问题,用QE或类似做法解决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银行之所以不愿意将贷款、平债置换成地方债,是因为通过其他形式持有政府性债务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债券。既然贷款、信托、平债仍然有隐性担保,风险与政府债券相当,收益却要更高,债券销售困难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要让银行对政府债券产生兴趣,根本办法是撤除其他投资品的隐性担保,让风险定价机制发挥作用,让地方债产生吸引力。

但体制改革涉及问题多,远水难救近火,因此最终不排除央行通过结构性政策为地方债顺利置换提供可能。这种开小灶、给地方定向优惠理由何在,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毕竟,支持三农、中小微企业和“棚改”人们可以接受,要把新增流动性定向引向地方债,道理又在哪儿呢?

## 别只顾对烟草加税点赞

吴睿钧

经国务院批准,自2015年5月10日起,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这是我国继2009年5月之后再度调整烟草消费税。此次提税迎合了当前国际上普遍对烟产品课以重税的大趋势。

对卷烟课以重税,不仅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能很好地利用价格标杆,来抑制烟草消费,保护公众身体健康。去年世界无烟日的时候,世卫组织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中国应将烟草税提高至卷烟零售价格的70%,而不是目前的40%左右。根据世卫组织的估算,在中低收入国家,烟草制品价格提高10%,可使烟草使用减少5%。因此,对国家层面出台的公共政策,舆论大都持赞同观点。

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由于这种公共治理的路径精准度不够,对控烟成效并不明显,而在增加国家和地方的税收上,效果却十分显著。因此,笔者觉得,倘若国家对烟草行业继续实行加税的话,不但起不到很好的控烟效果,反而还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一方面,会引发烟草行业,争上卷烟生产项目。基于烟草行业能给国家和地方政府带来滚滚财源的考量,一些地方甚至全国烟草主管行业,进行疯狂投资,加大生产量,根本无法避免。与此同时,高税收制度安排,极易诱致

走私、假冒和黑市交易盛行。这不仅会使非法卷烟和违法销售变得难以掌控,对消费者健康构成潜在威胁,而且也会扰乱整个烟草市场环境。与此同时,烟草加税会落到穷人头上。世界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穷国还是富国,穷人的吸烟率都远高于富人的吸烟率。据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统计,美国大约有4600万烟民,占总人口的23%;其中,男烟民多于女烟民,他们大多是未受过高等教育的贫困人口,有很多是非白人民居。泰国最近也发表了一项调查数据:在泰国1000万烟民中,64%属低收入阶层,他们受教育不多,比如工人、农民、司机等。由于税收是按消费卷烟的实际数量征纳,其累进性质十分明显,这就造成了比较贫寒的家庭向国库缴纳的税款要远远多于富人缴纳的税。又因为低收入群体对卷烟的过度依赖所引起刚性需求,如果烟草因加税涨价了,他们可能会去寻找更为廉价的劣质烟草来替代,或者会削减日常开支,甚至变卖家当来维持,如此一来,会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带来更大的危害。

更为重要的是,烟草加税有悖于税收法定原则。今年3月份出台的《立法法修正案》明文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当然,烟草消费税率变动,应该遵循立法程序,提请人大审议调整税率,通过后方可加税。而现在不过两个月,就违背了税收法定这个原则,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缺憾。

## 创业板指数站上3100点



创业板变创神板,指数突破三千关。机构仍敢放豪言,散户不怕当跟班。市场热情大激发,财富效应猛点燃。纸上富贵慎守护,终须落袋方为安。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 “65个证书仍找不到工作”能说明啥

朱昌俊

据报道,河南安阳准毕业生孙涛,大学四年狂揽65个证书,连续两年综合成绩全专业年级第一,创办过志愿者服务队,当过大企业董事长助理,开过传媒工作室,可如今凭借着这么多的优势,却找不到一份称心工作。要毕业了,他却又面临一份答卷:是能力重要还是学历重要?在“重学历,轻能力”的用人倾向屡屡受到诟病的今天,仅从标题看,孙涛的遭遇无疑又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注脚。但客观而言,只要通读新闻,了解到这位大学生的遭遇后,相较于同情,恐怕更多的是疑问。65个证书,连续两年综合成绩全专业第一,且并非通俗意义上的“刷题族”;创办过志愿者服务队,当过大企业董事长助理,开过传媒工作室。可谓专业、实践两不误。这样的学生

相信即便在重点大学也并不多见。所以疑问来了,真的优秀至此,为何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报道中,对于他要找什么工作,他对工作有着怎样的要求,却语焉不详。如此将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单方面归咎于用人单位“不重视能力”,已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事实上,较之于争论是能力重要还是学历重要,这个故事中的两个细节或倒是能让人看出一些端倪。一是“孙涛望着这些证书,有说不出的成就感,他觉得证书能证明他的能力”。但若将证书完全等同于自己找工作时的一种能力凭证,那么未免存在一种谬论。

去年有媒体在一篇《证书得越多,越好找工作?》的报道中就指出,近年来,不少在校大学生热衷于考取各种资格证书。在一些人看来,这能让他们在找工作时有更多“砝码”。然

而,有关人士指出,由于考试太多,证书太滥的问题突出,有的年轻人“手上拿着一大把证,可就是找不到工作”。为何用人单位反倒对于证书太多的应聘者“不感冒”?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不少招聘者已经注意到证书泛滥之下可能存在的“能力泡沫”,故而会刻意去规避那些“考证族”而更看重实际的用人需求。这应是证书泛滥现象所激发的反向作用。

第二个细节是,找工作遇阻时,孙涛并未过多从自身找原因,而是从一位学长那得到启示:学历远远比证书要重要。即便说这一结论在学长的身上得到了应验,但孙涛找工作的失败就一定源自于此吗?这样的因果论至是少值得怀疑的。譬如此前有媒体报道,从2009年到2011年,硕士生的就业率已经连续3年低于本科生。我还注意到,孙涛在毕

业之前就成为一名大企业的“董事长助理”,但后来“他意识到学习的重要,便辞去董事长助理工作,回到校园内复习考研”。这种转变是否也是源自学长的“经验”?而孙涛先后经历了董事长助理、考研、创业、找工作等系列的转变,这种“不够专一”是否也使用人单位对其产生不佳印象?

当下的社会的招聘中确有着某种程度上的重学历倾向,但对于个人而言,不管外部条件如何,成功就业只能更多从自身上找原因。一味将原因推给大环境或是跟着他人的“经验”跑,诸如信奉“学历远远比证书要重要”至少是不靠谱的,何况证书并不一定等于能力。因此,还理性看待“证书”的价值,看待能力与学历的辩证关系。而不是以“65个证书仍找不到工作”去论证“能力与学历”的倒挂。